

開放中的變遷

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

金觀濤 劉青峰 著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專刊(一)

開放中的變遷

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

金觀濤 劉青峰 著



中文大學出版社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設計、編輯及製作，並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 香港中文大學 1993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封面攝影：王苗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962-201-619-7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新界 沙田

承印：傳真廣告印刷公司
香港灣仔譚臣道 114 號廣亞大廈十樓 A 座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1840-1956) —
The Fate of Its Ultrastable Structure in Modern Times (in Chinese)**
By Jin Guantao and Liu Qingfe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3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62-201-619-7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Shatin, N.T., Hong Kong
Printed in Hong Kong

序

1989年8月盛夏，我們開始寫作本書時已經考慮到研究和寫作的艱辛了，但依然沒有料到要拖到今天——1993年8月——書稿才能付印。又是一個盛夏，我們辦公室窗外的青竹、門口池中的錦鯉，同四年前一樣充滿勃勃生機，時光卻在我們埋頭寫作中不知不覺流逝過去。寫作期間，幾度春秋，數易其稿。完成這本書成為我們這幾年生活的一個目標，它像隱蔽在濃霧中的一座高山，吸引着我們，令我們備嘗攀山時的興奮、疲勞，失去方向時的困惑、沮喪。今天，在我們接近目的地時，有一種如釋重負的喜悅，同時又有告別一個老朋友般的空虛和惆悵。

在寫作過程中，始終存在着表達的困難。困難不僅在於如何更準確、更概括地闡述內容，而且還在於必須照顧到一般讀者和專業研究者的不同要求。為了便於閱讀，本書各章均由正文和註解兩部分組成：正文盡可能簡明扼要地勾勒出論述主線；註解在正文中用〔 〕標出，是討論細節或引申出來的學術問題，有關文字敘述則放在各章正文以後。本書吸收了許多學者的研究成果，作為我們近代中國社會宏觀變遷論點的證據和細節。這些成果多以簡明的圖表收入各章正文和註解。因此，本書附錄中除了索引和參考文獻之外，還列出全書百餘個圖表的目錄。

任何一本書的寫作，總包含着比文字所能表達的更豐富的內容。它不僅是人追求真理、實現自我生命價值的體驗和經歷，也包含着支持這種探索的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友誼。首先，我們要

說的是，如果沒有香港中文大學為我們在流亡歲月中提供穩定良好的生活環境和研究條件，我們在四年中要完成這本書的研究和寫作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還要感謝香港「大學及理工資助委員會」(UPGC)資助本書的打印和研究助手費用。朱英先生曾校訂過本書的前四章；慶源先生認真地查核了全書引用的材料、通校全書，大大加快了本書的後期工作；李潔兒小姐近一年多來不厭其煩地錄入我們寫作過程中不斷修改的文稿；張素芬小姐製作了本書封面；孫立川先生做了部分編校；吳江波先生安排本書製作出版；鄭會欣先生作了最後的編輯工作。在此，我們謹向他們各位表示誠摯的謝意。

最後，我們要特別感謝張玉法先生和陳方正先生。今年5月，我們徵得張玉法先生同意，將本書初校寄到台灣，7月下旬就收到張先生的回函。張先生在百忙中通讀了三十餘萬字的書稿，並在史實和編輯兩方面提出寶貴意見。我們在定稿時採納了這些意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陳方正先生，作為我們的好友，四年來一直關心我們的研究、寫作以及本書的出版。特別是在書稿初校出來後，方正兄每周細讀一章，校樣上隨處可見方正兄批閱的文字和勾勾劃劃的痕迹。大到各章各節的論點，小到文字敘述表達、標點符號使用，方正兄都認真提出具體意見，然後與我們逐章討論，無疑對提高全書質量大有裨益。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在海外出書前就徵求專家和友人意見。可以說，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難忘的經驗。

金觀濤 劉青峰
1993年8月20日於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目 錄

序	vii
導言 尋找歷史之路	1
1 大時代的歷史感	1
2 逃避近現代史	5
3 孤獨者的回應	7
4 湧現「歷史記憶」	9
5 新意識形態的迷思	11
6 知識分子邊緣化和民間社會的消失	13
7 走向新的批判	16
第一章 超穩定系統的兩種行為模式	21
1.1 對新歷史觀的渴求	21
1.2 古代史和近現代史的統一觀	24
1.3 中國社會的獨特組織方式	27
1.4 一體化結構和王朝周期性更替	32
1.5 西方衝擊下的行為模式	38
1.6 各章內容簡介	45
第二章 對外開放和洋務運動	71
2.1 對西方衝擊反應的遲鈍	71

2.2	太平天國大動亂的歷史功能	74
2.3	「官辦現代化」的開始及其局限	79
2.4	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	82
2.5	甲午之戰：中國大驚醒	87
2.6	意識形態危機的類型和階段	91
2.7	從戊戌變法到義和團運動	95
第三章 一體化結構解體的邏輯		117
3.1	王權衰落與地方主義	117
3.2	清末新政：舊體制的自我摧毀	122
3.3	紳士城市化和新知識分子	126
3.4	長期趨勢：宗法家族的解體	130
3.5	城市興起與紳商資本主義	134
3.6	辛亥革命：紳權與王權的對抗	140
第四章 社會整合危機		167
4.1	共和國幻象	167
4.2	民主政治為甚麼失敗？	170
4.3	行政現代化的困難	174
4.4	洪憲帝制流產和軍閥失控	179
4.5	軍紳合流與農村的破壞	183
第五章 意識形態更替機制		211
5.1	新文化運動的三個前提	211
5.2	批判紳權	215

5.3	走出傳統角色的新知識分子群體	217
5.4	突破倫理中心主義	221
5.5	「整體性反傳統主義」	225
5.6	在「科學」、「民主」、「白話文」運動背後	228
5.7	啟蒙的異化	232
5.8	逆反價值與傳統結合	234
5.9	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	237

第六章 中國社會的重建

269

6.1	開放條件下的社會整合	269
6.2	列寧式政黨的功能	274
6.3	黨軍和北伐	280
6.4	工農大革命：新意識形態的傳播	284
6.5	國共合作破裂的原因	289

第七章 國民黨及其脆弱的統一

311

7.1	三民主義向傳統的回歸	311
7.2	金字塔的倒塌：國民黨政治結構	317
7.3	內憂外患下的「黃金十年」	321
7.4	八年抗戰和過度動員	327
7.5	泥足巨人的末路	334

第八章 中國共產黨的興起

359

8.1	共產革命怎樣與中國農村關聯	359
8.2	貧農經濟與農村建黨	363

8.3	馬列主義儒家化	370
8.4	毛澤東思想與當代「聖王」	374
8.5	幹部隊伍大擴張	379
8.6	逐鹿中原 城鄉決戰	382
第九章 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		411
9.1	超級官僚社會的確立	411
9.2	利用農業積累實現工業化	414
9.3	商品糧短缺和「統購統銷」	418
9.4	城鄉隔離和農業合作化	423
9.5	市場的萎縮	428
9.6	政治經濟一體化：放棄新民主主義	433
第十章 大歷史觀		461
10.1	解除魔咒	461
10.2	一體化結構的束縛	464
10.3	超穩定系統應付外來衝擊的模型	467
附錄一 圖表目錄		491
附錄二 參考文獻		496
附錄三 索 引		527

導言：尋找歷史之路

只要從睡夢中醒來，
黑夜本身是不足畏懼的。

《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是我們研究中國社會宏觀結構的第二本著作，它是《興盛與危機》的續篇。在這本書中，我們試圖以一種新觀點來詮釋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現代史，提出超穩定系統在對外開放條件下的行為模式。在論述正文之前，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如何寫這本書，也許是有意義的。

1 大時代的歷史感

青年時讀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的書，最難忘的是他寫《歷史研究》的經歷。一次大戰後，湯因比乘東方特快車自伊斯坦堡一路西行，巴爾幹半島上古遠縹緲的高山平野，使他想起昔日文明的光榮與血腥，一種奇異而壯麗的歷史感在心中湧起。他感到一次大戰的歐洲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寫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時代的類似。他把自己的構思寫在一頁紙上，從此一生就為實現青年時代打下的提綱而奮鬥。當時說甚麼也想不到，類似的故事居然也會發生

在我們身上。我們青年時代的探索，由自然科學涉足於人文歷史領域；我們為自己的歷史研究付出的代價——流亡，以及在流亡中繼續對近現代史進行思考，所有這一切都起源於青年時代的歷史感。

所謂歷史感，是指人突然對自己生活的時代有所領悟，把人類今天碰到的種種問題和數千年來我們祖先生活的社會聯繫起來，從而產生一種企圖超越某一個特定時代、某一種特定文化社會規範來考察歷史的意識。它往往出現在社會或思潮發生重大轉向的歷史關頭。我們對中國歷史的思考最早開始於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這種企圖重新審視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走過道路的歷史意識萌發於文化大革命時期並不是偶然的。今天，在二十世紀即將成為歷史的最後幾年，幾乎沒有人會否認二十世紀最重大的歷史現象是全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實踐的興起和失敗。只要追溯1989年後社會主義國家紛紛解體的歷史因果鏈，就會發現中國的十年改革是這一制度內部出現巨大自我斷裂張力的重要根源。而中國1979年後的改革開放正好是文革摧毀了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後果。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社會主義實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在這種轉折關頭所激發出的思考無疑有着特殊意義，何況這麼多年的經歷為我們提供了海外人文歷史學家很難具備的特殊視角。

六十年代中期，社會批判意識有兩個基本角度：一方面來自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勝負難分的拉鋸戰，它們各自用自己的價值體系來批判對方，形成五花八門的理論；另一方面是青年人的普遍反叛，新一代以自己特有的敏感和熱忱向權威提出挑戰，對一切現存制度的合理性進行再思考。而我們恰逢這兩股潮流的奇特交匯點，既感受並經歷過紅衛兵運動的狂熱，又為席捲整個西方的憤怒青年之反抗而激動。但是和西方青年不同，我們是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潮灌輸下長大的，了解這一政治文化巨獸內部的五臟六腑。當

文化革命中烏托邦幻滅，那些被馬列主義詞匯和革命熱忱掩蓋着的社會問題向敏感青年顯現時，我們突然被一種重大的歷史意識所震撼，這就是發現了中國式社會主義和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類似性。

也許，很多老一輩的人早已察覺到這一點，1949年共產黨進城，相當多的知識分子將其當作一個新王朝看待。我們和老一輩不同，深知社會主義本是批判資本主義、企圖超越資本主義的產物。無論是封建專制，還是產生這種專制的文化、經濟土壤，都是共產黨人力圖摧毀的東西。但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反傳統卻造就了一個做夢都沒有想到的後果——就在他們以為徹底砸爛舊社會並在它上面建立了一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新世界之時，實際發生的卻是在馬列名義下實行皇權主義、文字獄和封建專制。固然，馬克思主義者可以據此認為馬克思主義從未真正實行，現有的社會主義是假的，而自由主義也可以因此宣佈馬克思主義的虛妄。但我們認為，這一過程本身的意義遠超出這兩種價值判斷之外。它恰好表明在中國一百多年社會改造的歷程中，制約着中國社會變遷的深層結構沒有被意識到，結果是歷史好像在跟人開玩笑：本來想走進這一個房間，卻發現走進另一個房間。從世界範圍看來，社會主義實踐無疑是人類第一次有意識地干預社會演化，它的奇特後果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看都是全新的。當時，我們剛二十歲出頭，歷史感的湧現改變了往後的人生道路。我們放棄了自然科學的研究，決心轉向社會科學。我們隱隱感到，這個問題的探索也許要用一生的努力才能實現，它是向一個未知的龐大怪獸作戰。當時中國是最封閉的，幾乎看不到國外的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我們是從自然科學中吸取方法的。這就是把控制論、系統論引進歷史研究。

我們發現，從秦漢帝國建立一直到今天，中國社會深層組織方式一直沒有改變，這就是社會的整合建立在人們對某種統一意識形態的認同之上，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與社會組織一體化。正是這種

組織方式造成社會主義和封建專制的類似性。當時我們把這種思考寫成一份六、七萬字由三部分組成的提綱。第一部分是中國傳統社會組織方式研究，它包括在研究方法上批判經濟決定論，引進系統演化方法來建立社會變遷模型。由於中國傳統社會的組織方式是儒家意識形態與社會政治組織的一體化，就造成社會演化呈現出與西方完全不同的類型。在這種社會結構中，新結構難以在舊組織中成長壯大，舊社會結構瓦解後又會再次修復，社會演化呈一種奇特的動態停滯，我們稱其為超穩定系統。這種組織方式造就了中國古代盛大輝煌持久的文明，但社會進步積累又為周期性大動亂所中斷。當西方進入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時，中國也就從先進轉化為落後。超穩定系統假說解釋了中國封建社會在相對與世隔絕條件下長期延續的原因。

第二部分內容是研究超穩定系統受到西方文明衝擊後的行為，它應該包括用超穩定系統理論對1840年至今天的中國近現代史重新進行詮釋。當時，我們雖然明確地意識到，1949年大陸建立的社會是毛澤東思想和社會組織的一體化，在意識形態和社會組織關係上與兩千年的封建社會同構，但我們當時的學識不可能了解，傳統一體化解體後，中國為何還是會最終建立這樣一種結構。不過我們卻十分強烈地感受到，正因為在今天的社會結構中意識形態和政治一體化的組織方式未曾改變，當中國共產黨人用這種組織方式來實現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的社會理想時，它就導致了封建專制主義借屍還魂。

當時，我們還用這種社會組織方式來探討文化革命的原因和它帶來的後果，它是研究提綱的第三部分。三部分中第一部分最為詳細，它後來成為《興盛與危機》一書內容的基本思想。七十年代中期，我們在河南鄭州大學任教，從那個時候起就開始廣泛收集材料，與來訪的朋友討論，為今後實現這一提綱做準備。

2 逃避近現代史

人在青年時代所抱的理想，如同一個向四面八方湧射之源泉，任何一個方向之水源都可能會轉化為洶湧的激流。但是當你選擇了某一個方向，也許一輩子就跟着這一方向的激流走。如果不是有巨大的意外事變，往往再也不可能回到原有起點，去展開青年時代夢想的另一部分。我們的研究提綱也是如此。1979至1989這十年，中國大陸推行改革開放，出現了1949年後從未有過的思想文化發展的好氣候。我們研究提綱的第一部分獲得了充分展開。1980年，我們發表了論中國封建社會超穩定結構的論文，在學術界引起廣泛注意，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再次成為歷史理論關注的熱點。1981年，我們進一步把論文擴充成專著，《興盛與危機》一波三折，於1984年在湖南出版。在兩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整肅中，我們的觀點都受到批判。有人批判我們否定歷史唯物論，發結構主義史學在中國的濫觴；有人則認為我們搞歷史控制論，對中國出現「三論」熱的科學主義思潮要負責任。1987年，我們結束一年美國訪問歸來，開始對《興盛與危機》作全面修訂。我們吸收了近十年學術界的研究成果，驗證和細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假說，以對海內外各種批評作出回答。（《興盛與危機》的修訂本，由於「六四」，拖至1992年才改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與此同時，我們必須進一步錘煉方法論之劍，把來自控制論、系統論、突變理論中的內容和社會科學歷史結合，轉化為我們自己在運用中不斷成熟的新分析工具。

1979年到1989年這十年的生活緊張而忙碌。我們出了一本又一本書，與朋友們一起開創了走向未來叢書等民間文化事業。光陰飛逝，正如詩人所說「活得匆忙，來不及感受」。中年人的忙碌和沉醉於忙碌帶來的成功感，實際上和吸大麻差不多，用佔滿每天時間

來逃避人生的空虛，使他忘卻那個青年時代立志一生去追求的理想。正如孫行者劃地為牢不讓唐僧離開以免受外界傷害一樣，當時我們所有探索都有一個不曾逾越的限制，這就是閉口不談近現代社會變遷。事實上，無論是我們在哲學方法論上的創新，還是歷史文化探索，都只是青年時代擬下提綱第一部分之細化。而青年時代歷史感的主體，卻是對中國現代社會和傳統的類似性的體悟，近現代史應比傳統社會分析更為重要。可以說，我們是為了解決近現代社會變遷之謎才去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的。攻其堅必先利其器，我們卻整整十年沉醉在磨劍之中，好像造劍本身就是目的。實際上，這是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逃避。

這種逃避來自中年人特有的以成熟和堅強為掩飾的懦弱。青年人在追求真理時有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中年人卻由於深知前人之專業研究，了解這潭水有多深，就固守「不知深淺，切勿涉水」的信條。我們知道，無論從材料上，還是問題的複雜性上，中國近現代社會變遷的研究都遠比傳統社會更難，這是一個更為龐大的領域。任何一個僅僅了解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學家是不可以憑主觀想像和直觀外推來理解近現代的。我們在已開闢的領域中比較容易取得成果，但轉到近現代史，就可能被史料淹沒而一無所獲。而且，我們提出超穩定假說已幾次被官方扣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中國近現代史涉及的問題在政治上遠比古代史敏感，即使寫出書來，也難以在大陸出版。

青年時代的歷史感猶如初戀時對愛情的嚮往，它雖被中年繁忙的應酬和社會責任而造成的心靈麻木所壓抑，但有時仍會如大鵬般突然振翅欲飛，在被專業和理性禁錮的鐵籠中，帶來陣陣不安和騷動。直到某一個重大轉折的來臨，往日努力的成果和瓶瓶罐罐被意外事變打碎，在十幾年耕耘中自己築下的所有藩籬均被重大歷史事變拆除，青年時代的目標才會再次在生命和真理的追求中凸現出

來。這一天終於到來了，這就是1989年「六四」事件。我們又流浪遠方，像青年時代那樣聽從歷史感的召喚，再次進入新的探索領域。

3 孤獨者的回應

1989年4月初我們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邀請，作五個月的學術訪問。正在這段時間，中國政局出現了鉅變。我們所有的著作在大陸均被禁止發行，流亡的歲月開始了。當代學者常用「內在流亡」來比喻現代人內心的孤寂。在現代，人與人之間心靈的距離雖已被喻為如一個星球和另一個星球那麼遙遠，但仍不足以和真正流亡生涯中的孤獨相比。流亡是把一個人徹底和他原有的社會角色相孤立的過程。中年人慘淡經營十幾年的文化事業毀於一旦，多年共事的朋友群消失了，有的關在牢裏，有的亡命異鄉。他甚至不能照顧年邁的父母，不能再對兒女負起應有的教育責任。在原有的社會角色粉碎之後，一種類似於麻痺症般的無力感開始不斷擴展。本來，我們正努力推動事業不斷向前發展，是文化思潮的理性反思者，而在八九民運和稍後的時間，激烈的簡單化情緒代替了理性，批判意識被用道德為旗號的指責敗壞，中國和西方的關係一度退回到冷戰時期。作家失去了讀者，理論家失去了預設的論辯和說服對象。新文化的創造再次被政治干預和社會關切的變化所中斷。流亡者的鏡中形象不再是一個社會歷史和文化積累中的自我，而是赤裸裸孤立的靈魂和軀殼。對於流亡者，原來生活的社會賦予人身上的種種意義不再存在。薩特(Jean Paul Sartre)說，我寫作故我存在。加繆(Albert Camus)說，我反叛，故我存在。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中華民族歷史的苦難猶如蒼天一樣籠罩着我們的青春、生命和思想，從青年時代起，就意識到我們是為着中華民族未來的命運而

存在的。但是現在我們還能為祖國做甚麼呢？

香港中文大學位於八仙嶺之南，往北只要翻過兩重山峰就是中國大陸。我們常常站在陽台上，面對北方群山，看着太陽徐徐下山，身後華燈亮起，一個燈火輝煌的現代化都市和黑壓壓的北方構成明顯對照。我們在孤獨中痛苦地沉思，思考常被九廣鐵路上轟響疾駛而過的火車中斷。是的，對於孤獨的流亡者、立志把祖國的未來當作自己命運的中國人，我們既無政治權力，又無經濟實力，除了已被社會冷漠的文化學術研究外，我們甚麼也不會做，我們應該做甚麼呢？我們又能做甚麼呢？

中國也許真的又到了一切理論研究、任何文化創造都是多餘的時代，社會正在黑暗中醞釀着改變它的各種新動力。然而在中國歷史上，從來不缺乏各式各樣推動力。問題的關鍵在於，大多數新的動力出現時，它們往往是盲目的。我們的祖父輩不正是被它們推着走的嗎？到了我們的父輩，力的方向改變了，他們又被改變了的力推着走。八十年代，我們對父輩創造的精神果實和社會體制進行反省之時，卻發現自己站到了類似於我們祖父輩的立場。一代又一代人成了歷史重複和輪迴的工具。在巨大的歷史悲劇面前，憤怒開始平息，偏激之情也隨着時光流逝變得淡漠，熱情卻依然留在我們心中。一種把中國今天悲劇般命運和歷史遭遇聯繫起來的思考日益強烈，我們心中再一次湧現出歷史意識。正如歷史不能對十一億人的苦難無動於衷一樣，理論家也不能對自己民族在一百五十年中付出的代價無動於衷。尊重歷史最好的辦法是去大無畏研究她。我們再一次翻開青年時代的提綱，閱讀二十年前的文字，在種種不成熟的觀點和錯誤的史料背後，居然發現那些曾經激動過我們但後來卻認定是幼稚的東西仍然正確，心靈再次被青年時代的歷史感所震撼。

我們為十幾年來下意識逃避近現代史研究感到羞愧，決心着手寫《興盛與危機》的續篇，探索自1840年超穩定系統對外開放後的社